

显克维奇《旅美书简》:19世纪美国的真实图画

□张振辉

波兰作家、1905年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维奇的《旅美书简》(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旅游欧美时写的报告文学集,曾以书信形式发表于当时波兰报刊,后来汇集成册以《旅美书简》(以下简称《书简》)为名出版。作者描述了其途经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自然风貌以及个人的旅途生活,以其深厚的社会和历史底蕴、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读者,它是显克维奇的主要作品之一,在波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将它从波兰文原著译出,希望它在给中国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对认识当时的美国有所助益。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奴隶制的废除,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随着工业的发展,美国人口迅速增加,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显克维奇每到一个地方,对这些情况都有见闻。他对芝加哥这座新兴城市有许多好感:“街道简直是异乎寻常的宽阔,房屋到处都很大,而且显得庄严,它们的建筑形式和装点都十分豪华。”美国西部的繁荣还和金矿的开发有密切关系,显克维奇在加利福尼亚州野地难以数计的溪河里,看到“没有任何不同于金子的东西”。在怀俄明州,有的地方金沙大片堆积,有的地方金块甚至裸露在外,俯拾即是。19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铁路密如蛛网,显克维奇认为当地大部分城市都是由矿工新村发展起来的。“矿工盖着一排排房子,商人运来了货物,要卖给矿工,谋取利润,于是开商店,来了许多顾客,旅馆也开张了;因为人们有钱,便开设银行。在那些昨天还有狼叫、印第安人扒人头皮的地方,今天建起了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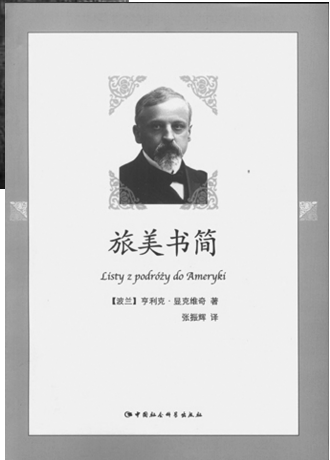


显克维奇认为:美国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个年轻国家的人有比古老欧洲更大的进取精神和劳动干劲:“这是一个多么年轻、勇敢、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内在力量的民族。”虽然工业发展迅速,劳动人民表现了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却很腐败。显克维奇对此深有了解。他到美国不久,就已看到政府、法庭和共和党、民主党内部的黑暗:“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庭像他们的法庭在诉讼事物上,有那么多营私舞弊。”这种舞弊“不仅可以说明诉讼的事,而且反映了美国所有行政机构的情况”。显克维奇刚到纽约,就对靠剥削割取家的美国资产阶级代表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乍看这不是一座居住着这种和那种民族的城市,而是一个商人、企业家、银行家、官吏聚集的地方,是一些世界主义者、

吸血鬼聚集的地方。”他明确指出,人民为了美国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统治者为了谋求私利却不择手段:“这是一个坏透了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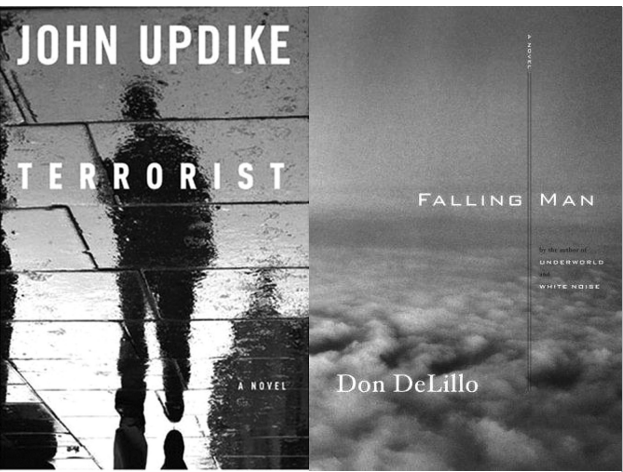
《书简》中对民族问题的论述也很多。在显克维奇看来,美国的民族矛盾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移民和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书简》对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得最多。显克维奇一次在从纽约去旧金山的途中,在车厢里遇见了要去掠夺印第安人的黄金、霸占他们土地的白人“冒险分子”。这是一些矿工,“他们期待在矿山获得神话般的利润”,而报纸上的描写“常常是有意夸张的,只能激起白人的仇恨,他们不是叫人们不去参加这些战斗,而是激励所有不安分的精灵去寻找血的冒险,去对红肤色的人进行报复”。白人殖民者“完全不把印第安人当人看待,他们把消灭印第安人看成是为人类立功。在边境上的美国人看来,

白人有如消灭响尾蛇、灰熊和其他有害动物一样的权利来消灭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也没有畏惧,照显克维奇的看法,“这个种族是坚强的,虽然没有开化,他们在全美的土地上,将毫不屈服地英勇牺牲,他们不和也不能与在他们面前以最坏形式出现的文明妥协”。面对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显克维奇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如果有人问我,真理在哪一边,我只要根据单纯的,而不是诡辩的原则,凭正义和良心判断,我的回答是,真理在印第安人一边。”显克维奇从纽约去旧



“9·11”之后美国文学发生了什么

□杨金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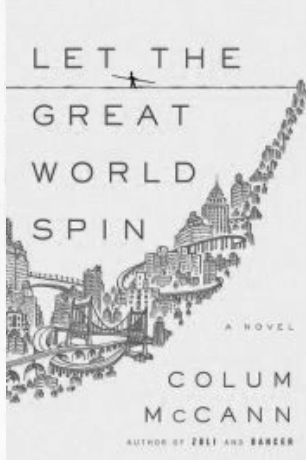
自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挑战与灾难丝毫不亚于上个世纪初。人们在欢呼科技文明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时依然感到心悸、焦虑与不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领土争端和区域性政局动荡是当下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信仰问题不断演绎人类的悲剧,多方位地印证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局部战争频繁爆发,伊拉克和阿富汗硝烟不散,“9·11”恐怖事件不断引发人类创伤记忆,病毒和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仍频频威胁和吞噬着人类的生命。也许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朝着祸福难测的未来悲壮地前行。世界文坛的作家们正以各自的方式打量这个世界,努力以笔作剑,刺痛人们逐渐麻木于种种不幸的心。可见,文学始终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进而表达思想,其中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常常又是语言跟世界的关系。新世纪作家们在热切地感悟人类文明智慧的同时,或加以拥抱,或加以拒斥。他们积极回应,或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在继承中开掘自我,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样,能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顿时发现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性的反思和后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或称之为后“9·11”文学。当代作家将“9·11”事件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在创作中巧妙地处理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美国后“9·11”文学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全球化意识,揭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作为生命意识表现形式的人之生存境遇也是作家们乐于书写的题材。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唐·德里罗(Don DeLillo)、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及其他新兴作家如萨弗兰·萨弗兰·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等都适时做出了回应。在他们的创作中,人们再次亲历人类的悲哀,并深切感悟浓郁的人文思想以及族裔差异和政治立场差异。他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无希望地书写全球化、文明冲突、历史记忆以及民族身份建构等时代性命题。

美国后“9·11”文学创作以宽阔的视野想象和审视恐怖袭击事件,并注入了历史反思和伦理拷问的内涵;或书写都市惊悚、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或对全球化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秘和逻辑进行批判,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叙事美学特征;即融进创伤、创伤记忆与叙事,以及文学虚构创伤于一体,在后现代语境下思考创伤、书写创伤、诠释创伤并超越创伤,使之演绎成新的历史叙事和创伤书写,并从人性角度探索创伤救赎和人文关怀等命题。

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恐怖分子》属于直接关注恐怖分子的后“9·11”小说。该作品迎合读者对恐怖分子既畏惧又好奇的心理,以一个普通少年如何被卷入恐怖组织的行动计划,如何心甘情愿地去充当自杀和杀人的人肉炸弹为故事线索,深刻反思美国社会,揭示了当代美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信仰问题。

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讲述了“9·11”后美国一个普通家庭情感离合以及心理和精神创伤的经历,展示了历史性事件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作者将看似混乱的不同人物的记忆碎片记录下来,再加以汇集,呈现出多重叙事声音。故事主人公基斯,现年39岁,从事律师职业。“9·11”后,他侥幸从世贸中心办公室逃生,重新回到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丽昂和儿子的生活中。该作品以文学方式揭示日常生活图景,凸显家庭和亲情的意义,并在见证历史、表



征创伤中表达伦理关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冷峻思考。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讲述一名居住在纽约的荷兰裔证券分析师一家在“9·11”恐怖袭击后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故事叙事者汉斯自由生活在荷兰,大学毕业后在伦敦工作,结婚生子,随妻子雷切尔到纽约工作,做银行证券分析师。“9·11”后雷切尔执意带着孩子回伦敦,二人婚姻濒临崩溃。小说发人深省:汉斯自嘲自己是“政治和道义的白痴”。整部作品通过文化视野再现历史并表达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彰显作家的使命,即关注现实和良知,用心灵去感悟世界,并表达深切的忧患意识和人文价值观念。

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拼贴了十多个不同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背景不同,靠着可能的姻缘际遇相互联系,都在曼哈顿附近见证了佩蒂特高空行走的“神迹”。人群中有助手、妓女、因越战失去儿子的母亲和父亲、地铁车站的流浪少年、电脑黑客等,这些人的命运与佩蒂特高空行走联系在一起。世贸中心的奇观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小说再现了一个大都市和一个逝去的时代,从中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信仰与欲望、爱与迷失、罪与拯救、母子情感以及家庭人伦等。

事实上,“9·11”文学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可看作是文学内容,又可看作是文学形式,在一个悲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命运、自由和生命的意义。因此,在表现手法和观照事物方面,“9·11”文学具有独特性,其主题也是多变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作家们将“9·11”事件与其灾难性事件联系起来,构成某种历史的隧道,如弗兰岑的小说《自由》就别具一格,刻画的是对人类自由的践路行径和遭受挫折的美国中年人生活景象。

“9·11”事件作为背景,影射阴影下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焦虑心态。叙事格调是审讯式的、质疑的,但也颇具

个性化。作家在思考人们亲眼目睹的一切是否真实,这些历史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个人体验,哪些体验是可以分享的,哪些优势是亘古不变的,适合每个时代;哪些东西是暂时的,易变的。许多故事的叙事者扮演了评论员和杀人的角色,总在不停地品评、分析和解释,多少还带有些说教成分。

由于后“9·11”文学针对的是恐怖事件,所以这一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又让人特别怀念宁静的生活,留恋人情、友爱。关注生命便成了这一文学刻意表现的思想主题,从中可以感悟到作家们丰富的人文精神。

观照后“9·11”文学首先应从现象入手思考其内涵。除了创伤主题外,这一文学类型还有许多不同的主题特征。它已对当前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历史主题的考量,作家的创作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反思、艺术实验、审



美题材的介入,包括媒介艺术。福厄的小说《剧响,特近》就是典型的例子。作品以博物馆呈现的方式刻画受害者创伤群像,用文字、图片、录音等多种媒介将几代人的创伤体验融入作品,打破了人物的年龄、性别、种族、国籍等界限,以更广阔的视野探讨恐怖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包括对全球化进程中灾难的思考,融创伤人物、创伤书写和承载创伤记忆图片于一体。这也是今后文学史写作必须思考的课题。

总之,“9·11”文学的主题很鲜明,始终围绕或影射“9·11”恐怖袭击事件,并将其视为反人性的罪恶渊薮。后“9·11”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批判了美国的伊斯兰主义,还是依然参与了反思、审视伊斯兰民族主义?与新闻媒体报道一样,这一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渲染恐怖与可怕,并在国际政治范围内消费它,使其成为世界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我们不禁要问:表面批判伊斯兰狭隘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9·11”文学是否同样陷入误区,成为宣讲另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同谋?

在全球化、跨国界研究语境下考量包括后殖民文学在内的文学叙事及其对“9·11”的回应,不能仅把视域局限在美国,而应该放眼世界,了解其他国家文学又是怎样反观“9·11”事件及其文学表现的。如今,“9·11”事件成了叙事策略或媒介,不断被书写、被强化。而后“9·11”作家对恐怖灾难的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作家在表达文本意义时所采取的文化立场也不尽相同。美国作家同其他国家作家在反思和再现“9·11”历史现实方面明显存在差异。值得关注的是,后“9·11”文学在思考人类命运、参与公共记忆、医治精神创伤、表达人文关怀和重塑伦理价值等方面均有启示性,其对家庭伦理、族裔差异和全球化问题等所做的思考无疑给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意义。

法国有一句名言:“一切皆由歌曲起始”,巴黎尤其如此。眼下,巴黎市图书馆举办的《歌声飘逸中的巴黎》回顾展就体现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该展览组织者立意展现巴黎作为一个大“歌厅”的面貌,让参观者回顾从蒙马特尔高地飘逸到塞纳河石堤和桥头的歌曲,缅怀曾经震撼街巷,留声后世的歌者。

《巴黎文化周报》报道说:“清晨5点,巴黎苏醒”,雅克·杜特龙演唱的这首歌的著名叠句,精彩地表现了我们可爱的首都同深人民心的歌曲之间的血肉关系,唤起人们对往昔的追忆。”巴黎多媒体音乐馆馆长吉尔·彼埃莱解释筹划回顾展初衷时说:“我们同历史博物馆合作,一直在寻找一个以巴黎为主题和显示本馆声音馆藏价值的方式,惊喜地发现,迄今还未曾有过以《歌声飘逸中的巴黎》为题的展览和书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令人感到自豪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像巴黎这般被人歌唱,连梦幻城纽约也得自愧不如。”

事实确实如此,参观者可以在此听到组织者从3000多首关于巴黎的歌曲中精选的400余首,看到20世纪初“黄金时代”到50年代的稀有歌谱原件,欣赏朱丽叶·戈莱果、查理·特莱索、伊夫·蒙当、艾迪特·皮亚美、蜜丝坦盖特、苏茜·索里朵尔和查理·阿兹纳乌尔等不同时期走红歌星的风采。

法国的传统歌曲原为一种诗篇吟诵与歌曲咏唱结合的民间音乐形式,类似中国的宋词,由艺人按固定曲谱填词歌唱。在18世纪到19世纪有“卡沃”咏唱社,涌现诸多优秀咏唱诗人,《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便为其一。近代,传统歌曲演变为流行曲,受众越来越广泛,走上消费娱乐之道,与传统咏唱歌曲必须遵守一定的诗词格律有所不同,分为大众歌曲、民间歌谣、儿童歌曲以及饮酒歌等类型,不一而足。

现今巴黎的主要歌厅“奥林匹亚”是法国和国外来法巡演当红歌星必经的音乐殿堂,另有“狂放牧女”、“鸣蝉”、“阿波罗”、“巴达康”和“阿尔汗乐”。至于规模较小的咖啡馆音乐厅则在各区星罗棋布,常客众多,为塞纳河畔的夜生活添彩增辉。

追根溯源,蒙马特尔不愧为巴黎咏唱歌曲的摇篮,也是此次展览的起始。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被誉为“法国现代歌曲之父”的阿里斯蒂德·勃鲁昂(1851-1925),杜鲁兹·罗特莱克为他绘的肖像遍布巴黎各家报亭和圣米歇尔大道的旧书摊,特别出现在陈旧明信片上,他被视为巴黎歌坛的泰斗、蒙马特尔自由公社的精神象征,他早年相继在高地上的“黑猫”、“芦笛”等多处歌厅演唱,蜚声整个巴黎。作为咏唱诗人,他的歌曲语言淳朴,甚至采用巴黎土语。《去维莱特》《去梅尼勒蒙坦》《白玫瑰》等反映巴黎城郊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歌曲,被收进《街巷》《歌曲与独白》《大路上》等几部歌集里。《巴黎文化周报》记者评说展览厅里勃鲁昂的形象道:“他风趣幽默,气质独特,唱出了巴黎和巴黎人的新歌。他的歌词包含强烈的社会内容和斗争性,涉及民众的贫困和生活艰辛,令人感动,赢得很大威望”。

在《法国社会革命歌曲集》里,他创作的《卡奴》追述1831年岁末里昂红十字岗丝织工人起义,惨遭奥朗公爵和苏尔特元帅血腥镇压的历史,发出“劳动而生,战斗而死”的激昂召唤,人们似乎听到被剥削者反抗的雷鸣。勃鲁昂的生涯显示了咏唱诗人的社会天职,在而今的流行歌曲中几乎已丧失殆尽。

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起,随着法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巴黎歌曲的内容与风格显著改变。歌厅节目不再表达贫困民众心声,而转向对巴黎的热情,开辟起娱乐节目的前景。一代新歌手如莫里斯·舍瓦里埃、查理·特莱索、路易·玛里亚诺等陆续登上歌坛,咏唱巴黎的歌曲融入电影,还有的作为风笛舞会和披卡尔广场放浪场景的伴奏。凡有巴黎声韵的歌曲表演都会吸引大批观众,当时最火的是“黑珍珠”女歌星约瑟芬·巴盖尔,她唱遍巴黎的叠句“我有两个最爱,我的故乡和巴黎”,将花都升华到了法国人精神恋爱的顶峰。可与巴盖尔媲美的艾迪特·皮亚美,被誉为法国歌坛“最灿烂之星辰”。皮亚美出身贫寒,在街巷唱起,后被识者相中进入歌厅出道,应邀在电台录制唱片,短短几年就红极一时。她自编自唱的名曲《玫瑰人生》流露出天生的纯真爱情和对光明的崇仰。然而,皮亚美未能逃脱残酷的生活厄运,最后被病魔夺走生命,给人间留下神秘传说;有获好萊坞奥斯卡金奖的传记影片《玫瑰人生》为证。

男歌星中,有大众十分喜爱的查理·特莱索,以其诗人气质唱出了生活的欢乐,《蓝花》《克里奥妮儿》《街角》《忠贞》《年轻时代》和《爱情余音》《大海》等500余首歌为巴黎人传唱不绝,清澈的灵感丰润了普通人的“巴黎梦”。

贴近普通百姓的歌曲在蒙马特尔和贝勒维尔等巴黎的民众街区传播,直到二战之后转移到圣日耳曼草地文化区,迎来了另一歌坛明星朱丽叶·葛雷果。这位被誉为“日耳曼草地的缪斯”的女歌手从1949年起始,于“波比诺歌厅”以咏唱雷蒙·格诺《你若想象》和萨特的《白外套》走红,至巴黎第18区的“帕拉迪奥姆”歌厅达到顶峰,后又步入影坛。葛雷果今年已年逾八旬,仍十分活跃,可谓歌坛“女寿星”。曾与她齐名的芭尔芭拉上世纪50年代末在“水间酒馆”表演,她的芳名让人联想到民众诗人雅克·普雷维尔的一首配曲名诗《芭尔芭拉》,让听众倍感亲切。这一时期,歌曲发生嬗变,一年年逐步向现代化的消费社会转型,迎合时髦娱乐的需求。

当然,也不乏例外,如列奥·弗雷、乔治·勃拉斯森和雅克·勃莱尔等人,仍能以引起百姓共鸣的社会题材歌曲为主调,占据着歌坛一隅。乔治·布拉斯森的《奥弗涅人》《猩猩卫士》两曲,说唱矛头直指既立秩序的不公正,而列奥·弗雷的《漂亮小姐儿》《感谢撒旦》,声调则更为激烈,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往往为既立道德的卫道士们所不容,几被当局边缘化。这后一批歌者的共同特点是,大胆采用新节奏、新旋律,自由抒情诗化。与此同时,“红磨坊”、“狂放牧女”、“卡西诺”等诸多歌舞厅相继推出《这就是巴黎》《巴黎眩晕》《巴黎狂爵士》一类轻歌艳舞节目,让夜巴黎在声色中动荡。

《歌声飘逸中的巴黎》展出了一位日本歌迷收藏的乙烯基封套法国歌片,以及随歌声传播的街巷黑白相片,营造一派怀旧氛围。最惹眼的是陈列出女歌星蜜丝坦盖特当年登台穿的霓裳羽衣,系由巴黎“卡里拉时装周博物馆”提供的珍藏,加上她甜美的玉照,令观众仿佛亲临这位“巴黎风趣化身”在“狂放牧女”歌舞厅演唱的现场。有评论称:“在本届展览的主题系统里,塞纳河及其堤岸和石桥,与为情侣们演唱的法国歌曲融为一体,情调浪漫,流露出巴黎特有的忧郁。歌声飘扬在人潮涌动的交通途中,在公共汽车和地铁里,让人又听到了塞纳尔·甘斯布尔愤慨的名曲《丁香线上的轧票员》,体味巴黎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社会风习的变迁,“美好时代”歌中的“窈窕淑女”转眼变成了“巴黎妞儿”,跟彼卡尔广场上的浮浪子弟调情。进入上世纪“五月风暴”时代,出现了绰号“克洛·克洛”的埃及血统歌手克洛德·弗朗索瓦的狂放无羁和偶像女艳星达丽塔的波普歌曲。今岁,法国各家媒体先后纪念这两位时髦星人的忌辰,又掀动昔日娱乐圈里滚动的热浪。D8电视台专场重播达丽塔风靡一时的一场场演唱会,让观众重温上世纪80年代巴黎的音乐旧梦。达丽塔曾名噪法兰西现代歌坛40余载,但华丽外表掩不住家庭不幸和个人感情挫折,她于1987年5月3日自尽,香消玉殒,迄今已不幸整25个春秋。斯人已逝,但歌韵依然流芳巴黎。本届巴黎历史歌展最后追忆的是男歌星穆鲁吉于1951年唱的:“我苦恋巴黎,/心怀地的街巷,/地林荫道忧郁的空气。/一朝一夕,月逝去,/每当离开巴黎到遥远的异城,/我总闻到地铁的气息……”

歌声飘逸中的巴黎

□董纯